

# 抵抗、吸纳与共生:数字时代纸媒的再媒介化进路<sup>\*</sup>

王仕勇,王昭东

(广西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南宁 530004)

**摘要:**以“再媒介化”理论为视角,聚焦“痛报”与“口袋本”等纸媒创新案例,探讨数字时代纸媒的转型路径。研究提出一条纸媒以“抵抗—吸纳—共生”为逻辑进路的自我重构之路。研究指出,纸媒可以通过发扬自身物质性价值,抵抗数字媒介的加速、入侵与虚拟,与其形成差异化竞争;通过吸纳数字媒介的互动性逻辑,在形式、内容与价值层面实现创造性转化。最终,纸媒可以与用户和数字平台构建以“社交”为界面的共生关系,形成新的媒介生态。研究认为,纸媒的转型绝非简单的数字化迁移,而是通过激活自身独特的媒介属性,蜕变为数字生态中不可或缺的情感载体与文化节点,这一观点为传统媒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超越融合范式的新思路。

**关键词:**再媒介化;纸媒转型;媒介物质性;数字共生;慢媒介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5)06-0130-10

近年来,纸媒行业出现了两种颇为“出圈”的创新举措:中信出版集团、轻读文库等出版机构推出的“口袋本”,以及《重庆晚报》《都市快报》等报社推出的“痛报”。其中,“口袋本”以“适合通勤随身携带”为核心卖点,通过小开本、轻量化、高颜值的物质形态创新,将书籍重塑为一种现代生活的“随身伴侣”;“痛报”则以报纸形态为载体,以二次元动漫插画为主要设计语言,成为年轻亚文化群体追捧的“硬通货”和收藏品。“口袋本”“痛报”等纸媒的创新凸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它们并未遵循当下媒介发展的“数字化迁移”的主流路径,而是通过对纸媒本身的物质形态、内容形式和价值理念的创新,成功实现了市场与口碑的“逆势突围”。“口袋本”和“痛报”的出现不仅让纸媒在“消亡论”的阴霾中重见光亮,同时也提示我们,面对在时效、互动、便捷等功能维度上相对于数字媒介的巨大落差,纸媒谋求生存与发展还存在着另一条路径。

<sup>\*</sup> 收稿日期:2025-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5AXW002)“中国互联网政策变迁研究”;重庆社科规划项目(2021YBCS43)“百年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工作的经验及启示研究”

**作者简介:**王仕勇(1970—),男,四川巴中人;博士,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研究。

王昭东(1999—),男,甘肃定西人;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王仕勇,王昭东.抵抗、吸纳与共生:数字时代纸媒的再媒介化进路[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6):130-139.

## 一、逻辑转换:从媒介融合到再媒介化

### (一) 媒介融合思路下的纸媒转型与不足

数字媒介时代,面对“纸媒消亡论”的质疑和困境,学界与业界的应对策略主要以“媒介融合”范式为主,主张纸媒应主动拥抱数字技术,利用数字技术来增强或重构自身的媒体功能和价值。在这一范式下,学界已有研究主要以纸媒行业的“5W”为基本框架提出融合策略,例如在传播者层面强调记者群体需进行思维调整、方式创新和技能拓展<sup>[1]</sup>,纸媒机构则应通过跨界、跨域和跨媒等方式,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资源<sup>[2]</sup>;在内容层面认为纸媒应当产出有深度和特色的内容<sup>[3]</sup>,坚守核心价值,维护公信力和媒体权威<sup>[4]</sup>;在渠道层面认为纸媒应当与新技术深度融合,探索纸媒“云传播”、移动传播和短视频传播等传播渠道的新形态<sup>[5]</sup>;在受众层面提出纸媒应在与新技术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拓展针对用户的“新闻+”服务生态<sup>[6]</sup>。在此范式的指导下,《广州日报》《人民日报》等传统纸媒通过构建“中央厨房”融媒体平台、大力发展新媒体矩阵及实施移动优先战略等一系列举措,有效拓展了传播渠道与影响力,被视为转型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出,现有的“媒介融合”范式是一种纸媒向数字媒介的单向融合,其本质是以数字技术重构甚至取代纸媒的媒介物质和技术属性。这一路径虽以求生为初衷,却在过程中不断消解纸媒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的独特价值,最终将导致纸媒媒介形态的彻底消解,本质上是一种“向死而生”的过程。

### (二) 再媒介化理论的引入

在“数字中心主义”的媒介融合范式之外,美国学者戴维·博尔特和理查·格鲁辛提出的“再媒介化”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数字时代纸媒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博尔特和格鲁辛认为,“如果一个媒体‘画地为牢’式封闭发展,将逐渐僵化并丧失创新力,最终被淘汰。但它可以通过‘再媒介化’借用其他媒体的资源和灵感,获得新的意义”<sup>[7]45</sup>。所谓的“再媒介化”是指一个媒体在另一个媒体中的再现,即一种媒介挪用其他媒介的技术、形式、社会意义等方面的要素和特征,其目的不仅仅在于重制或复原其他媒体,更为重要的是在其他媒介的基础上探索并发现一种新的媒介样式或形态<sup>[7]56</sup>。

可以看到,博尔特和格鲁辛并未将“新旧”作为划分媒介优劣和权力关系的标准,而是从更为平等的角度理解新旧媒介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揭示出媒介发展的本质是新旧媒介之间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补充、整合和调和的过程。他们认为“新媒体(需要)以改革旧媒体的特定方式不断求‘新’,旧媒体也(可以)通过重塑自身来应对新媒体的挑战而变‘新’。新旧媒体在相互修正的过程中缩小差距并延续两者的关系,确保旧媒体不被淘汰,新媒体依然以各种方式依赖于旧媒体”<sup>[7]65</sup>。换言之,在“再媒介化”理论的视角下,媒介的发展不是线性替代式的此消彼长,而是一种彼此嵌入、互为参照的共生过程。在再媒介化进程中,新媒介从旧媒介中汲取其形式、技术与文化逻辑,确保自身的“新”根植于历史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生态;旧媒介则在新媒介的冲击下,基于自身的媒介特性对新媒介的形式、技术和文化逻辑进行回应和吸纳,进而重新定位自身价值,实现创造性进化。

更为重要的是,博尔特和格鲁辛认为应该将媒介的再媒介化实践放入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理解。他们强调,“我们反驳的是这样的观念,即任意一种媒介都能够独立运作并建立起自己孤立和纯化的文化意义空间”<sup>[8]</sup>。也就是说,任何媒介的形成、运作和发展,都处在与社会文化意义空间的交织互动中,二者互相影响。在此基础上,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进一步明确了“再媒介化”概念中的意识形态意涵,认为“新媒介从旧媒介中获得部分的形式与内容,更为关键的是也继承发展了后者中一种具体的理论特性和意识形态特征”<sup>[9]</sup>。总的来说,媒介的再媒介化实践包含形式、内容和价值理念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由表及里、从技术到文化的完整分析光谱<sup>[10]</sup>。

综上,本研究选择“再媒介化”理论为视角,以“口袋本”和“痛报”等纸媒的创新实践为案例,重新审视数字时代纸媒如何通过抵抗、吸纳与共生三条路径,实现自身在形式、内容和价值三个层面的再媒介化,进而在当下的社会和媒介环境中确立其不可替代的位置。

## 二、抵抗:纸媒物质性本体的彰显与价值重估

所谓“抵抗”,是指纸媒采取与数字媒介互补甚至相反的媒介策略,以抵抗数字媒介的强势“融合”。面对数字媒介的全面渗透和社会文化的深度重塑,纸媒需要在保留和发挥自身的物质性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对内容表征与价值取向的重构,在当下的信息环境中重新与大众建立联系。如今,人类社会正处于哈特穆特·罗萨所描绘的“加速社会”中,科技加速发展、社会加速变迁以及生活节奏的加速导致了时空、行动与自我的异化<sup>[11]</sup>,这为纸媒的抵抗提供了社会文化语境。

### (一)具身性屏障:纸媒物质形态的抵抗策略

形式,指事物的本质及其结构方式,兼具外在形态与内在组合特征。纸媒的“形式”指其作为信息载体的物理属性与感知界面,包括开本、材质、印刷工艺、装帧设计及其所共同构成的触觉、视觉等感官体验。在罗萨所描述的“加速社会”中,数字媒介呈现出“入侵性媒介”的特征——它不仅被人采纳和使用,更介入人的行为、观念和交往,并据此重塑社会结构<sup>[12][121]</sup>。在数字媒介的不断嵌入和加速下,个体正丧失对媒介的感知,数字媒介如同“义肢”一样伴随着人类,使大众产生了严重的媒介依赖和成瘾,个体漂浮于数字虚拟空间中,导致了“现在的萎缩”;同时个人生活中工作、日常交往、家庭活动、社群参与等等不同社会行为的边界逐渐消失,导致了私人领域的坍塌。在此背景下,人们便自然倾向于回归那些具备物理触感、可预知节奏与交互真实感的媒介形态,以期重建其对自身媒介经验的操控感与拥有感<sup>[13]</sup>。

一方面,作为“纸”的纸媒,通过坚守并彰显其物质性本质,可以在数字媒介生态中扮演恢复“媒介间性”的角色。媒介间性理论认为:通过文化生产实现的意义表达往往需要以“媒介间”的距离为物质性前提,构成文化的符号和叙事要素因媒介间性机制的普遍存在而在流通过程中持续变形和演化,并在这一过程中给大众带来疏离感乃至陌生感,从而激发批判性思维的形成<sup>[12][126]</sup>。因此,在一个富含“间性”的媒介环境中,依赖和成瘾是很难发生的,因为用户所接触的信息生态始终是充满异质性和距离感的,他们也就难以获得完全“舒适”的沉浸性体验。作为一种具有稳定实体形态的技术物,纸媒以其有限的容量、确定的形态与非侵入式的存在,构成了一种“可被感知的媒介界限”。它不像数字流那样无限推送、自动更新,而是以物质的完形与封闭性,阻断了信息的无限侵扰,为使用者划定出清晰的认知与时间边界,从而为恢复个体对媒介的真实感知提供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作为“媒”的纸媒,可以凭借其独特的触感反馈、翻阅的节奏韵律与精心经营的视觉语言,在读者阅读时召唤其进入一种专注、沉浸的心流状态。相较于数字媒介以视觉为中心、以电子屏幕与算法节奏为核心特征的交互范式,纸媒对触觉、嗅觉等被遮蔽的身体感知的调度,能重建“人—媒介—世界”的感知关系。如狄德罗在《论盲人书简》中指出:“触觉使我们确信外部事物确实存在,也是唯一能够验证它们的形状及是否真实在场的感官”<sup>[14]</sup>。这种具身化的交互仪式不仅在多感官层面与读者建立了情感关联和象征认同,更在认知与体验深处构筑起一道抵御数字干扰的具身性屏障,从而在复杂的媒介环境中有效地重建读者的私人领域。

### (二)策展性叙事:以专业筛选对抗信息熵增

数字时代,传播技术的下沉带来了网络空间信息的大爆炸,移动设备的泛在连接、社交媒体中“劣币驱逐良币”的信息生态,以及用户本身的信息素养不足等种种原因,导致人们常常会因为时间、注意力等



认知资源有限,面临信息过载、认知焦虑的困境<sup>[15]</sup>。对此,纸媒在内容层面的抵抗策略,应着眼于自身独特的媒介和表征属性,通过扮演数字文化的“策展人”,应对数字时代的信息过载与认知困境。

纸媒成为数字文化“策展人”,意味着它需依据自身的形态特征与用户定位,从繁杂的数字信息流中遴选、组织并呈现优质内容,以此抵抗算法的流量逻辑与信息无序状态。内容策展,是指针对特定主题,从某个或多个视角出发,对已有的信息内容进行搜集、筛选、组织、保存,进而呈现、分享的过程<sup>[16]</sup>。策展行为主要包括两个核心环节:一是专业化筛选,二是结构化呈现<sup>[17]</sup>。在专业化筛选阶段,纸媒有限的版面要求其尽可能呈现高质量有代表性的内容,提升内容的价值密度和权威性;同时,“少而精”的内容筛选恰好契合用户在信息过载背景下对简洁、可靠认知体验的需求。如三联书店“满格-历史人文”系列口袋本,从海量人文内容中精选《何以中国》《李白:漂泊天涯与愁心寄月》等核心主题,并将单篇篇幅控制在3 000字左右,以“去冗余留核心”的内容呈现,为用户提供高效信息获取。

在结构化呈现阶段,纸媒通过版面布局、视觉设计和印刷工艺,不仅能为内容赋予清晰的信息层级与审美秩序,将碎片化信息重构为逻辑清晰、意义连贯的认知图谱;而且通过主动引入多元视角、设立内容对比或设置跨语境关联等措施,纸媒能帮助读者打破算法推荐导致的认知隔离,引导读者进入更开放的意义解读。仍以“满格-历史人文”系列中《李白》口袋本为例,该口袋本以三面开口刷边工艺、低饱和封面设计构建视觉引导,又按“人生轨迹—作品内涵—时代背景”逻辑编排《李白》一书内容,使读者对李白获得了超越零散诗歌的整体性认知。

### (三) 价值重估:“慢媒介”与公共性的再建构

数字时代的社会加速首先指向的是时间结构的改变。现代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使社会的时间结构逐渐从线性、持续、准确的工业性的“钟表时间”,转向点状、散乱、没有持续性的“媒介时间”<sup>[18]</sup>。在数字时代,“媒介时间”进一步加速为对即时性的追求,在移动通信设备和互联网的技术座架上,养成了随时随地沟通、传播和接收信息的习惯,彼得·沃德勒称其为“永久在线,永久连接”<sup>[19]</sup>。与此同时,时间的加速“消灭”了空间。媒介通过建构数字时间,将以往要在很长时间内获得的信息缩短为瞬间,用时间的压缩消灭了空间的距离,催生了依附媒介“加速”存活的即时性文化<sup>[20]</sup>。时空结构的改变造成了个体的感知悖论,如梅洛维茨所说,“通过电子媒介,无论在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在我们所处的任何地方。但是当我们无处不在的时候,也没有了特定的地方”<sup>[21]</sup>。因此,纸媒可以通过重塑“慢”与“真”的媒介意识形态,以“稳固”对抗“流动”,以“沉淀”对抗“消逝”,既在空间维度重建具身化的公共对话现场,也在时间维度构筑可留存、可传承的文化物质基础,从而在数字生态中确立自身不可替代的文化位置。

在“慢”的层面,对纸媒来说,不管是作为“纸”的物质性体验,还是作为“媒”的仪式性操作,都是其在加速社会中占据“慢媒介”生态位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袁艳认为,技术之“慢”并非出自技术的某种固有属性,而是产生于特定的技术和文化操作,这种操作让技术某些原本隐形的物质性变为可见,使技术成为“在场”<sup>[22]</sup>。如前文所述,纸媒可感知的媒介形式、独特的触感反馈、翻阅的节奏韵律与精心经营的视觉语言等,都使读者在阅读纸媒的时候感知到技术的在场,从而进入韩炳哲所谓的“生命的凝思”,品味“飘散着芳香的时间”<sup>[23]</sup>,避免坠入忙乱飞奔的时代。在此基础上,纸媒还可以通过更多创新进行“慢”的建构,例如可以通过定期发行和更新,为读者营造一种可预期的、富有节奏感的接触仪式,在信息即时泛滥的数字洪流中建立起稳定而稀缺的时间秩序。

在“真”的层面,纸媒可以凭借其物质性与文化象征意义,通过“时空占据”与“文化沉淀”双重策略,抵抗数字媒介的虚拟性与易逝性,重构公共意义与集体记忆。一方面,纸媒可主动运用更大开本、主题化视觉策划与定期更新等策略,超越信息载体的功能限定,转型为塑造公共文化、激发群体对话的“公共景观建构者”。例如,当前已有众多主打怀旧与文艺主题的餐厅、酒吧、咖啡馆等公共消费空间,将过期报纸

视为一种复古的、具有审美性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媒介,用作墙面装饰、区域隔断或氛围营造元素,借由实体占据重新激活公共空间的对话潜能与文化温度。另一方面,纸媒可通过版本限量、编号发行、特装设计与艺术合作等方式,将自身从即时性信息产品转化为具有收藏价值的文化物件。在这一语境下,纸媒不再是速朽的新闻载体,而是承载时代印记、审美观念与文化精神的物质档案,以其可触摸的实体性、设计的独特性与发行的稀缺性,抵抗数字信息转瞬即逝、迭代频繁的遗忘特质。例如,某些独立杂志与艺术书刊通过手工装帧、作家签名、插图版画等方式,强调其作为收藏品的艺术价值与长期意义,进而吸引读者珍藏媒介。

### 三、吸纳:对数字“互动性”的转译与内化

所谓“吸纳”,是指纸媒作为一种旧媒介“反向”再媒介化数字媒介的形式、内容与文化逻辑,以实现自身的革新发展。隋岩等认为,互动性是手机、电脑等新媒介的根本特征<sup>[24]</sup>。在数字媒介时代,互动性指向的不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操作反馈,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逻辑与用户体验。互动性强调媒介使用的沉浸参与、即时反馈与多维连接,其核心在于打破传统单向传播的壁垒,构建一种开放、响应且可延展的意义生产过程。在2016年8月召开的第12届全国网络编辑年会暨2016年数字出版与新媒体研讨会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副主任刘成勇就曾提出,我国目前传统纸媒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读者”变为“用户”,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互动性<sup>[25]</sup>。因此,具备互动性是纸媒“反向”再媒介化数字媒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 (一) 界面重构:纸媒对数字互动性的形式吸纳

数字媒介时代,移动终端所定义的互动性已深刻重塑用户对媒介形式的期待,其核心在于追求一种即时响应、操作开放且具身参与的使用体验。纸媒在形式层面的互动性变革逻辑在于,首先通过形态革新具备即时响应性和场景适配性,与用户建立随身连接;然后通过形式设计进一步增加用户的互动体验。

首先,纸媒需要突破传统静态的阅读场景设定,通过物质形态的革新主动嵌入受众碎片化、流动性的日常生活间隙之中,实现即时响应和场景适配。物质形式的革新的核心在于,通过大小、重量与材质的精细设计,降低纸媒的获取与携带成本,使之能够像数字设备一般融入通勤、等候、差旅等流动的、非正式的时空情境中。例如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经典百句》口袋本系列图书,明确提出该口袋本系列的主要目标受众是“通勤时间里的上班族+出差旅行途中的求知者+需快速抓取中华经典名言名句的使用者”<sup>[26]</sup>。为了满足受众的这些场景化需求,该口袋本系列采用32开本设计,使其不再是需要放在桌面上、双手捧着阅读的笨重媒介,转而成为能装进口袋、像手机一样单手持握的移动性媒介,进而能够精准嵌入用户碎片化的生活间隙,实现纸媒与加速社会中用户的流动时空的再适配。

其次,在此基础上,纸媒需进一步将互动性转化为具体的形式语言,通过可操作、可反馈、可延展的物质界面设计,使用户从静态的“读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例如,可以通过在书籍、报纸等纸媒的边缘预留笔记边栏或设置可书写区域,使用户能像使用手机一样随看随记;通过设计可撕页、可折叠结构引导读者手动拼合信息碎片或构建立体模型,将阅读转化为具身的认知游戏;通过内置二维码,使读者可使用移动设备扫描获取动态图像、音频讲解或扩展信息,构建“纸媒触发-数字延展”的交互回路,在保留纸质阅读聚焦感的同时融入数字媒介的层次性与流动性等。

#### (二) 语态转译:纸媒对网感文化与叙事逻辑的内容吸纳

纸媒在内容层面具备“互动性”,要求其在内容选择上捕捉并策展符合大众兴趣与文化潮流的议题,在语态和叙事逻辑上吸纳并转译数字文化的表达方式与叙事结构,最终与用户形成认知和情感层面的深

度互动。

在内容层面,如前文所述,纸媒根据自身媒介特性对数字内容的策展,可以缓解信息过载和算法推荐带来的认知困境。同时,信息内容在与读者的互动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其本身就具备媒介的互动属性。因此,纸媒对特定文化主题与圈层化内容的组织和策展,能主动呼应并承接数字原生内容中已凝结的用户关系与情感认同,避免市场转化的“冷启动”。例如,《都市快报》推出的子刊《都市痛报》,通过与《盗墓笔记》《全职高手》等经典热门IP的联动,不仅将自身打造为承载高质量动漫的、具有收藏价值的媒介实体,而且广受相关IP粉丝的追捧,获得了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

在语态和叙事的转译方面,纸媒需要在语态和叙事逻辑上更加贴近大众,以便能够融入当下社会大众的日常交流话语。李立峯认为,“一种媒体吸收另一种媒体的话语与材料并融合到自己的内容中来,经过调试再传播出去是再媒介化的主要方式”<sup>[27]</sup>。在叙事学的视角下,叙事是“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修辞互动”,<sup>[28]</sup>语态和叙事结构是双方进行动态的建构身份和协商关系的工具。文学理论家伊瑟尔曾提出“隐含读者”的概念,即“每一部作品都在自己内部把所谓的‘隐含读者’编入代码”<sup>[29]</sup>,对“隐含读者”的考量会影响文本的语态和叙事结构。在纸媒的转型中,需要将自身内容生产的“隐含读者”从传统的严肃型读者转变为当下趣缘化和情感化的用户。

一方面,纸媒需要在语态上更加活泼近人,以便能够融入当下社会大众的日常交流话语,进而尝试创新、引领和塑造新的交流范式。主动将弹幕语言、网络梗、表情包等数字符号元素,通过字体设计、版式构图、插图融合等纸媒特有的视觉语法进行“转译”,使之成为版面中有机的叙事单元。另一方面,纸媒内容需要在叙事逻辑上从传统单向、线性、闭环的文本叙事转向互动式、场景化、分众化的多模态叙事。首先,应打破“作者中心”的线性闭环结构,运用“叙事留白”召唤用户参与,构建互动式叙事。纸媒可借鉴伊瑟尔的“召唤读者”理论,在叙事中刻意设计信息缺口,让用户成为叙事的延伸者而非结论接收者<sup>[30]</sup>。其次,转向场景化分众叙事,精准匹配不同趣缘群体的需求。数字时代的“隐含读者”是按兴趣划分的小众群体,例如针对宠物爱好者,可将科普知识转化为“我家猫呕吐后我如何应对”的情感化故事。最后,应融合数字多模态逻辑,充分发挥纸媒的视觉叙事优势。将文字为主、图片为辅的传统模式升级为文字与视觉协同叙事,用信息图替代文字冗余,用视觉符号增强叙事网感,如在娱乐报道中融入手绘风格表情包和弹幕式批注作为视觉旁白,打造“文字讲故事+视觉补情绪”的多模态体验。这些叙事逻辑的转型,本质是从以纸媒为中心的传递逻辑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互动逻辑,通过激活参与、精准匹配和强化体验,真正将数字叙事优势深度内化,实现纸媒叙事模式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 (三) 参与式赋能:打造可参与的纸媒

洛根在《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一书中指出:“我们所谓的‘新媒介’是这样一些数字媒介:它们是互动媒介,含双向传播,涉及计算,与没有计算的电话、广播、电视等旧媒介相对”<sup>[31]</sup>。这一表述蕴含着人们对于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发展所赋予的最重要的期待——通过互动而实现的参与性<sup>[32]</sup>。这种参与性具体指向两个层面:一是人的个体维度的参与,即经由人对于技术的控制而实现的人对自身的感知和人的全面发展;二是人的公众维度的参与,即通过社会层面的参与性文化,实现信息和知识的民主,将个体从大众媒体的霸权下解放出来。因此,纸媒在形式和内容层面对互动性的再媒介化,最终的指向是将“参与”从一种可选的用户行为,升华为纸媒存在的根本价值主张。这意味着纸媒不再仅仅是一种“可交互”的物体,而是成为一种能激发深层参与、维系共同体关系、并赋予行动以意义的文化装置。

实际上,不管是前文所述的纸媒凭借自身物质性为读者带来的触感反馈和阅读仪式,还是通过互动性设计形成的可操作、可反馈的物理界面,都构成了读者对纸媒在个体维度的参与。然而,在价值层面的再媒介化进程中,这种参与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营造一种“慢”的阅读体验,而在于其本身就是一种旨在



实现主体性建构的“自我技术”。读者通过批注、折叠、拼合等身体性参与行为,主动介入并重塑了媒介文本的最终形态与个人解读。这一过程将阅读从一种纯粹的认知消费,转变为一种反身性的自我对话与实践。纸媒的价值因而超越了其内容载体功能,成为一个可供读者进行自我书写、意义赋予与身份形塑的互动界面。它通过赋予用户改造媒介形态的权力,使他们从意义的消费者转变为意义的生产者,并在这一创造性实践中获得了对自身主体性的确认,这是纸媒在个体参与维度所能提供的重要价值。

同时,纸媒对参与性价值的再造,需实现更广泛的公众维度的参与性实践,即通过更深层次的开放和互动,将自身塑造为群体共创和维系文化共同体的公共平台。这要求纸媒重构传统的“传者-受者”的单向权力结构,打破其在形式创造、内容生产和出版发行等各个层面的封闭性,赋予读者平等参与的权利。具体而言,纸媒可通过建立机制化的众包与协同创作模式,将公众智慧深度融入媒介生产的核心环节,例如在形式创造层面发起封面设计公众投票或插画师公开征集,在内容生产层面策划基于用户投稿的专题报道并开辟“读者来信”等专栏,在出版发行层面尝试众筹预售或“读者赞助出版”项目,使支持者直接成为出版计划的共同决策者。此类实践不仅能拓展内容生产的边界,更在本质上将纸媒转变为公共文化的催化者与协调者。它超越了数字平台上常见的浅层互动,通过制度性开放使公众得以真正介入意义生产的社会过程,从而实践了参与性文化中的“赋权”理想。

#### 四、共生:构建以社交性为界面的生态互补关系

如前文所述,纸媒通过形式、内容和价值三个层面的抵抗和吸纳,在当下的媒介生态中确立了自身独特的媒介本体性,并实现了基于互动逻辑的创造性转化。然而,纸媒要在飞速发展的技术潮流中生存,还需要与数字媒介及其他社会行动者构建一种协同进化、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共生的概念源自生物学,描述了两种及以上生物种群间出于生存需要,逐渐与其他生物走向联合,共同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从而形成互相依存、相互合作、协同进化关系的现象<sup>[33]</sup>。共生理论引入经济学和社会学后,袁纯清将其概括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其中,共生主体是形成共生关系的基本单位,共生主体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传递的媒介、通道或载体则构成了共生界面;共生模式是不同共生单元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包括偏利共生、互惠共生等;共生环境是指共生模式存在发展的外生条件<sup>[34]</sup>。基于这一视角,下文将通过对纸媒与用户、纸媒与数字媒介两对核心共生关系的分析,揭示纸媒如何通过将“社交性”内化为关键共生界面,在数字生态中实现从功能性共存向结构性共生的跃迁。

##### (一)情感共同体:纸媒与用户的互惠共生关系构建

社会交往的需求是人的本质需求,也是人成为社会人的必要条件。“卡茨和阿卡赫斯的‘永恒联系’概念、齐美尔的‘社交性’及彼得斯的‘纯粹传播’都说明了人类有社会交往的内驱力”<sup>[35]</sup>。数字媒介环境下人与媒介的社交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用户通过媒介获得社交满足,媒介则借此积累注意力资本与经济收益,形成持续发展的基础。对于纸媒而言,将社交性“再媒介化”为自身的属性,进而与广大用户建立以社交性为基础的互惠共生关系,能为其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一共生关系的建立存在嵌入和拓展两条路径。

所谓嵌入,是指纸媒通过针对性地开发自身的审美性、收藏性和符号性,成为特定群体的身份符号和社交资本,进而嵌入该群体成员的“媒介组合”,实现跨媒介、跨圈层的传播。“媒介组合”是安德里亚斯·赫普提出的概念,指在某一社会领域内相互配合的不同媒介的组合<sup>[36]</sup>。以各大报社推出的二次元痛报为例,痛报凭借特定的内容选取和视觉设计,成为符合二次元群体身份符号的纸质媒介,同时痛报采取的限量发行有意制造了一种稀缺感,将原本标准化的机械复制品转化为富含象征资本的收藏性物件,使痛报成为

该群体稀缺的社交资本。于是,已经购买到痛报的用户会将其拍照上传到网络空间,没有购买到痛报的用户则会在网上“求购”,在这一过程中痛报不仅作为“社交物”流转于各二次元爱好者中间,同时二次元爱好者的分享和交流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触到痛报这一纸质媒介。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纸媒的文化影响力,更通过稀缺性发行和符号消费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实现了用户身份认同与纸媒生存发展的双向互惠。

所谓拓展,是指纸媒主动建立并维护线上或线下社群,自身成为社交的入口与纽带。安德森曾指出,作为政治共同体之民族的诞生与印刷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报纸为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手段<sup>[37]</sup>。在纸媒盛行的时代,报纸、书籍等纸质媒体通过内容和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便可以使位于不同地区互不相识的人们形成观念上的共同体。在当下,纸媒的社群构建策略则更为直接与主动。一方面,纸媒可以通过再媒介化二维码、社交账号等数字接口,将自身转化为连接线上社群的实体入口。例如,痛报、口袋书等纸媒通过印制二维码,引导读者加入特定的线上社群(如微博超话、QQ群、Discord频道),从而建构起围绕特定文化趣缘的、可即时互动的数字共同体,使纸媒本身成为加入社群的“钥匙”与身份凭证。另一方面,纸媒亦可通过组织线下读书会、作者见面会、主题展览等活动,将线上聚集的社群关系导向线下实体空间,实现线上线下社交场景的闭环联动。这些实践不仅深化了用户归属感,更使纸媒从一次性的内容销售转向可持续的社群运营,通过活动参与、会员服务等模式开辟新的价值来源,在情感联结与经济收益上真正实现共生发展。

## (二) 从寄生到互惠:纸媒与数字平台的价值循环与生态互补

在当前主流的“媒介融合”的情景下,纸媒与数字媒介是一种“寄生”的关系:纸媒的内容、品牌与权威性成为数字平台的廉价养分,后者通过聚合、分发与再加工这些资源获取流量与商业价值,而纸媒自身却在用户流失、广告萎缩与品牌稀释中逐渐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未能从这种单向的价值输送中获得对等的回报与进化动力。纸媒与数字媒介的共生关系要超越此种寄生模式,迈向基于优势互补与价值互哺的互惠共生,需通过重构纸媒与数字平台的互动模式,将纸媒重新定位为与数字媒介的“价值共创者”,从而实现从单向依附到双向赋能的转变。

具体而言,纸媒可依托其内容权威性、深度性与公信力,与数字媒介的即时性、连接性与技术禀赋形成协同互补。例如,纸媒通过主动策划具有公共价值的话题、开展深度调查报道,为数字平台提供高质量、高可信度的信息内容,帮助平台提升内容品质与用户信任;数字平台则通过其算法推荐、社群运营与多元分发渠道,将纸媒内容精准推送至目标受众,扩大其传播半径与社会影响,并借助打赏、付费订阅等数字变现模式反哺纸媒内容生产。更进一步,双方可共同开发创新内容产品,如联合打造基于纸媒IP的线上专栏、播客或短视频系列,纸媒负责内容策划与质量把控,数字平台负责技术实现与用户触达,最终通过收益分成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此种共生模式不仅有助于纸媒突破发行与传播的物理限制,触达更广泛的受众并开辟新的营收渠道,亦使数字平台得以丰富内容生态、提升文化品位与舆论影响力。最终,纸媒与数字媒介的关系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二者在相互依存中不断调适自身功能与定位,共同推动媒介生态系统的多元化与可持续发展。

##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剖析纸媒在数字时代的再媒介化进路,审视传统媒介与新兴技术的共生关系。纸媒“抵抗-吸纳-共生”再媒介化实践,既是其对数字文化的适应性策略,亦是一种在技术主导时代重构自身存在意义的努力。



在技术所形塑的加速社会与沉浸式传播环境中,纸媒通过强调物质性、慢体验与仪式感,抵抗数字媒介的虚拟性、易逝性与过度连接,试图为用户提供一种可触摸、可感知的“此在”稳定感。它通过策展性叙事、互动式设计参与性平台的建设,吸纳数字逻辑以实现自我更新,却又在本质上致力于对抗信息过载、认知碎片化与身份流动化所带来的生存焦虑。纸媒的转型因而超越单纯的功能调适,成为一种具有深刻人文关怀的“反数字化”实践——它既源于人对深度、意义与真实联结的根本需求,又旨在为人在数字洪流中提供一处沉思与栖居的“飞地”。

## 参考文献:

- [1] 张泽红. 传统纸媒全员向新媒体转型的探索与实践——以澎湃新闻为例[J]. 青年记者, 2022(21): 13-15.
- [2] 吴锋, 罗赞杰. 媒体融合发展的四种策略——基于国内4家上市新闻传媒单位的个案分析[J]. 中国出版, 2015(2): 10-14.
- [3] 胡智艺. 新媒体时代纸媒多元化创新发展研究[J]. 出版广角, 2022(17): 83-86.
- [4] 于汶平. 新媒体时代纸媒的突围与发展[J]. 青年记者, 2019(29): 50-51.
- [5] 姜翼飞, 辛拓. 传统纸媒的智能化融媒体传播格局探析——以《广州日报》为例[J]. 出版广角, 2020(21): 49-51.
- [6] 赵铂. 数字化时代纸媒的数据变化与转型发展趋势[J]. 传媒, 2022(23): 44-46.
- [7] BOLTER J D, GRUSIN R A. 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45-65.
- [8] 韩晓强. 走向媒介本体论: 欧美媒介理论文选[M]. 韩晓强, 杨国柱, 朱兆宇, 等, 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24: 121.
- [9] 延森. 媒介融合: 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 刘君,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92.
- [10] 刘涛, 蔡雨耘. 形态·语法·意象: 融合新闻的“再媒介化”叙事语言[J]. 新闻与写作, 2021(4): 74-80.
- [11] 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M]. 郑作或,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149.
- [12] 常江. 当“断联”成为奢侈品: 数字戒断的媒介文化想象[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9): 119-129.
- [13] 常江, 方杰云. 触感政治: 媒介尚古主义视域下的技术怀旧与文化抵抗[J]. 现代出版, 2025(6): 11-21.
- [14] TUNSTALLKE. Blindness and Enlightenment[M].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209.
- [15] 代宝, 续杨晓雪, 罗蕊. 社交媒体用户信息过载的影响因素及其后果[J]. 现代情报, 2020(1): 152-158.
- [16] 吕琳露. 内容策展的特点、实现及发展[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2): 133-138.
- [17] 曾庆香, 陆佳怡. 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生产: 主体网络与主体间性[J]. 新闻记者, 2018(4): 75-85.
- [18] 连水兴, 邓丹. 媒介、时间与现代性的“谎言”: 社会加速理论的传播批判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6): 37-42.
- [19] VORDERER P, KOHRING M. Permanently online: A challenge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1): 188-196.
- [20] 翟志远. 媒介时间的文化偏向与社会反思[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4(1): 12-16.
- [21] 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 肖志军,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120.
- [22] 袁艳. “慢”从何来? ——数字时代的手账及其再中介化[J]. 国际新闻界, 2021(3): 19-39.
- [23] 韩炳哲. 时间的味道[M]. 包向飞, 徐基太,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 61.
- [24] 隋岩, 李燕. 从谣言、流言的扩散机制看传播的风险[J]. 新闻大学, 2012(1): 73-79.
- [25] 聂昌昭. “互联网+”时代的报网融合[J]. 青年记者, 2016(29): 79-80.
- [26] 小开本图书成Z世代新宠? 出版机构实操分享[EB/OL]. (2025-07-31)[2025-08-31].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https://mp.weixin.qq.com/s/TSS1qg\\_EPhzXTapDqNSkA](https://mp.weixin.qq.com/s/TSS1qg_EPhzXTapDqNSkA).
- [27] LEE F L F. Contents and effects of newspaper coverage of talk radio in Hong Kong: A study of remediation through content adaptation[J].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13(2): 222-244.

- [28] JAMES PHELAN. Somebody Telling Somebody Else: A Rhetorical Poetics of Narrative[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7:63-65.
- [29] 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1.
- [30] 成业,殷国明. 人工智能诗歌写作的读者认知与“重写”——由“小冰”诗歌中的风景引发的思考[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30-36.
- [31] 洛根. 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M]. 何道宽,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4.
- [32] 张慧喆. 虚假的参与:论短视频文化“神话”的幻灭[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9):114-118,124.
- [33] QUISPEL A. Som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symbiosis[J]. Antonie Van Leeuwenhoek,1951(1):69-80.
- [34] 袁纯清. 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1998:7.
- [35] SCOTT W. CAMPBELL, YONG J P. Social Implications of Mobile Telephony:The Rise of Personal Communication Society[J]. Sociology Compass,2008(2):371-387.
- [36] ANDREAS HEPP. Deep Mediatization (Key Ideas in Media & Cultural Studies)[M]. Routledge, 2019:57.
- [37]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9.

## Resistance, Absorption, and Symbiosis: The Remediation Path of Print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WANG Shiyong, WANG Zhaod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Guangxi,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mediation”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innovative cases in print media such as “Pain Paper” and “Pocket-sized Book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for print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The study proposes a path of self-reconstruction for print media following a logical progression of “resistance-absorption-symbiosi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print media can leverage its own material value to resist the acceleration, intrusion, and virtuality of digital media, thereby forming a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on. By absorbing the interactive logic of digital media, it can achiev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form, content, and value. Ultimately, print media can build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users and digital platforms with “sociality” as the interface, forming a new media ecosystem.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nt media is by no means a simple digital migration, but rather a process of activating its unique media attributes to evolve into an indispensable emotional carrier and cultural node within the digital ecosystem. This provides a new line of thought beyond the convergence paradigm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edia.

**Keywords:** remediation; print media transformation; media materiality; digital symbiosis; slow media

(责任编辑:杨 睿)